

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论析^[*]

王增智

(云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每个时代都有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而形成不同的理论创新成果。“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当代中国实践和中华文明底色对如何科学审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关系所作的重要理论创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经由“相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性质规范着“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前提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其中国立场性要求的现实指向是“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基于“新的文化生命体”塑造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又勾勒了“第二个结合”的文明逻辑及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之世界意义。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相关理论问题,对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理论前提;现实指向;文明逻辑;世界意义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7.003

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将人类的实践活动把握为文化,文化塑造文明。文明赓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世代守护,更需要顺应时势、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提出了“第二个结合”,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尽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一种历史性事实,“第二个结合”一直嵌入其中并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在观念中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还有待明确。“第二个结合”以“魂脉”与“根脉”的灵肉关系构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廓清了曾有的各种错误认识。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深刻把握和阐释“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内涵,对构建当代中国独立自主的话语体系、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形塑中国式现代化国际叙事等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理论前提: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

作者简介:王增智,法学博士,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前沿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元叙事研究”(23XKS008)的阶段性成果。

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1]这一表述鲜明地表达了“两个结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根深叶茂。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这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2]2023年6月30日,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他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3]这些论述均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之本”的重要地位及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即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和作用下,这种现代转型才能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昭示,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有力有效推进“两个结合”。由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研究“两个结合”的理论前提。且这一理论前提内在要求“两个结合”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顺序具有不可颠倒性。

以“第二个结合”为例说明,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由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地位决定的。“魂脉”之“立党立国、兴党兴国”指导思想的根本性决定了其优先性和主导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规定性。如果顺序颠倒了就降低了“魂脉”的统摄引领地位,从而否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规定性,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社会主义性质;二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内在要求决定的。在空间体量和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赓续发展具有五千年历史而不中断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必须回答的重大时代问题。历史昭示,在选择文明赓续发展路径时,必须“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4]自近代中国走向现代以来,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探索均以失败告终。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辟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毛泽东同志曾基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分析认为:“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5]邓小平同志也同样认为资本主义道路不适合中国,他曾指出,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同时也“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6]亦即,不管是作“别人的附庸”还是“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都有悖于中华文明的内在理想追求,而这种追求从根本上影响着对其赓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跟中国文化密不可分。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历史同样昭示,这个基因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激活。正因如此,二者的有机结合才发生了“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7]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性质上属于社会主义,在形态上属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有一种颠倒了结合顺序的观点认为,既然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8]那么从中华文化不断丰富历史进程看,中华本土文化与外来思想文化的结合就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包含但不限于资本主义某些文化的中国化。且这已为作为中华文化

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某些文化的结合所表征,如“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但我们不能据此就得出结论:在非马克思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引领下,中国大陆也可以完成近代以来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艰巨历史任务而实现现代转型。其内在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实践表明,基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高度契合性,决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激活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基因,而儒家文化只属于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远比“亚洲四小龙”要复杂得多,如基于人口规模,在中国大陆再小的问题乘以人口规模都会变得很大,而一种文明的赓续发展首先要解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因为只有劳动者才是一切文明和财富的创造者,没有劳动者的劳动就没有文明,而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其不可能解决像中国这样超大规模国家人民的生存问题,更不要说发展了,这已为国民党的历史性失败所证明。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无法实现整体性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这说明了国家或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其选择的现代性转型方式和路径也会不同。鉴于此,我们既要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以更好地利用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更要基于传统文化基因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转型之路。把作为现代思想集成的马克思主义同具有五千年历史而不中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双脉”的“强强结合”新能源,“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9]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走歪路和邪路,拥有蓬勃发展的动力。质言之,我们既要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更要在自信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滋养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

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一种主流文化或主导性文明赓续发展方式下存在的多样性补充,即一体与多元的关系(“一体多元”叙事范式不仅适用于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而且还可以拓展到更为宏阔的理论空间)。如中国大陆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因历史原因港澳台则暂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印度曾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一国内的地方执政模式,如喀拉拉邦在共产党执政期间,该地区人民平均寿命、受教育年限以及人均国民收入等主要指标,均位列当时的印度第一。以上种种,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种文化现象实际上体现了一个文明体赓续发展进程中的一体多元性关系,即“主导或主体”与多样“补充”之间的辩证关系。以中国为例,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尽管在当下全中国范围内存有港澳台呈现的中华文化与非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现象,但这种局部地区的特殊情况只能是作为具有主体性、主导性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体或整体之必要补充,属于“多元”性质,能够起到“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10]的作用。事实上,这种“一体的整体性”与“具体的多元性”在我国“五大文明”建设方面均有体现,如政治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经济上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社会领域的多阶层性、生态多样性决定的多措并举治理方式等。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多”才有了在“多”的博弈中生成的围绕“一体”的积极向上活力。亦即,这些“多”都是为“一体的整体性”服务并在其指导下从事活动,即是“一体”的“多”且不能离开这个“一体”。这充分展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同时,这种具有补充性的多样性存在也有力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具体环境中的创造性。

概言之,马克思主义灵魂地位的第一性不容动摇。这决定了我们讨论“两个结合”应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前提,不能因为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或局部地区存有非马克思主义就成为忽视或无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借口,抑或错误主张儒化马克思主义等。

二、现实指向：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梁漱溟曾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中阐释“中国文化个性殊强”时讲到“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且“自具特征,自成体系”。^[11]表达了中国文化基于一种自足性而具有强自主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在五万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历久弥坚弥新,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12]而与古中国文明齐名的其他文明古国至今只能在尘封的历史典籍中寻觅其曾经的光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13]也正是因为走自己的路,中华文明才绵延至今。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强调走自己的路,就是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14]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15]最终“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16]这两个“必然”警示我们在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要坚持自信自立,不做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17]亦即,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作为独立自主精神的话语表达,走自己的路,既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赓续发展中华文明的必由之路,更是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百年来,正是基于走自己的路的独立自主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独立自主,首先要坚守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这是实现精神独立自主的内在要求和保证。主体性是一个哲学范畴。民族主体性既包含本民族内个体的主体性也包含民族整体的主体性,体现为在与他人、他民族交往中所形成的独立、自由和平等等价值的获取和展现。中华民族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具有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地位及特征。自秦汉以来,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对内基于中央权威的大一统、对外基于“和而不同”“行王道”从而四海来朝的强主体性文化共同体。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18]中华民族主体性跌入低谷。五四运动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华民族主体性意识开始走出低谷,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日益提升,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巨变使中华民族主体性得到了空前展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主体性从而国家主体性主要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性(对内有效治理,对外有力自主)的充分展开,是独立自主立党立国重要原则的体现。毛泽东同志曾强调:“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19]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0]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21]概言之,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主体性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基于“两个结合”指导下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成就建立起来的,不仅极大提升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主体性,而且也极大提升了中国人民的个体主体

性,且在世界大变局中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家内政外交事务中更加有力、有理和主动,中华民族主体性更加彰显,为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保障。

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独立自主,要坚守中国立场和兼容并蓄。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既包括个人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也包括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但不论是个人还是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都内含了立场的规定性。独立自主本身也是某种立场规定性的反映。一个没有立场的个人和民族,也谈不上独立自主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就要坚守中国立场,这是中国人之中国、中华民族之中华的内在规定性要求,否则就无法确证“我是谁、我们是谁”的问题而沦为虚无。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坚守中华民族主体性,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22]并在1944年《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23]邓小平同志更是直抒胸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4]等。兼容并蓄主要是指如何处理好马、中、西的关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强调了一种具有现代性的理想方位和追求路径,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强调了一种文明赓续的连续性、再出发的立足点及独特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一方面要在具有现代性理想诉求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另一方面又要立足中国从而承接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独特性,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根基。离开了“魂”就迷失了未来方向和现代追求动力,离开了“根”就不是中国的从而缺乏立足点支撑。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含了鲜明的中国立场。在坚守中国立场的前提下,学习可以“网罗古今中外”。毛泽东同志曾在谈到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25]这就是说,即便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坚守中国立场,立足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能发生。邓小平同志曾在谈到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26]这就是说,在学习外国建设经验时也要坚守中国立场,否则就会导致失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27]他们都强调了学习的中国立场问题。其原因在于:只有明确了中国立场,才能懂得“为谁而学”和“为谁而化”的问题,兼容并蓄的实质是基于中国立场需要我们“学习什么”和“化什么”,从而增强学习诸种文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我们常讲的“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其中的“今”和“中”实际上也暗含了当代中国立场或独立自主性的兼容并蓄思想。归言之,只有在坚守中国立场前提下去融会贯通各种文化并创新发展,才能确保我们要实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独立自主,要反对精神殖民和文化霸权。所谓精神殖民,就是从思想上(主要是意识形态)控制和奴役他国人民,瓦解他国人民的精神,使其接受自己的意识形态(含价值观),形成屈从于自己的思想文化认知(与“思想殖民”“文化殖民”及“和平演变”的基本内涵具有一致性)。其基本手段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尤其互联网渠道防不胜防)在他国或明或暗渲染、灌输殖民思想。在意识形态斗争依然激烈的今天,西方敌对势力加强了在我国推行精神殖民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如在文

教方面,西方对中国的教育输出、中国对西方教育的盲目接受状况仍未彻底改变,“毒教材”也屡禁不止;在文宣方面,基于西方资本支持,网络平台上的辱华题材仍刺激着中国人的心灵;在文艺方面,贬低、丑化中国形象(包括英雄人物)的历史虚无主义剧情和言论仍在漫延;在文产方面,西方资本将自己的价值观包装后直接投资中国的文化产业,或者借助各类国际奢侈品牌、产业品牌在中国的销售夹带价值观私货。通过这些手段,企图在日常生活中瓦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精神殖民的背后实为一种或隐或显的文化霸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就要坚决地反对西方在全球推行的精神殖民和文化霸权,不陷入西方精神殖民的圈套,不以附庸身份思考问题,独立自主地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28]这就要求我们要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尤其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各种思想、价值观念交流交融交锋前所未有,而只有增强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保持战略定力,朝着自己的奋斗目标奋勇前进,用“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品格有效抵制精神殖民和文化霸权,才能在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中彰显“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29]

三、文明逻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形态,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现代形态。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程中,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方式出现了重大转型,由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从而使各民族内部和整个世界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0]正是在这种宏阔的铁律性趋势背景下,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文明开始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这一方面说明以农耕为主的中华文明赓续发展方式必须切换到现代文明轨道(即“新的工业的建立”及新型民族国家的形成),才能顺应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华文明现代赓续发展的曲折性和艰难性,即只有通过革命“拭尘”才能走向现代文明(不管是蒙尘还是拭尘,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根”还在。正因如此,我们要探讨的是如何转型而不是除根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实现了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现代转型)。基于中华文明积淀凝结的“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特征,在届时的中国如何建立“新的工业”从而建设现代文明以应对外患,很快就被提上了清廷的议事日程,并在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得到了具体呈现:洋务运动的推行和关于中体西用的论争。如果撇开其历史局限性,洋务运动的推行和关于中体西用的论争可视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开端(现代化在中国的肇始),尽管“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及其现代意义要到20世纪初期才被表达出来,但这并不影响其早期的实践探索(实践在先,理论总结提升在后,这是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反映)。而随着清廷的一系列被动改革失败又说明了在以农耕生产方式仍占主导的社会结构中很难建立起现代文明。这也被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所佐证(尽管其后期颁布了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资政新篇》,但其还未来得及实践就成了历史文献)。历史表明,在以“新的工业”发展及民族国家逐渐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性载体时,以基于农耕的王朝统治形式(不管是既有的还是改朝换代的)为载体来建设和发展现代文明将举步维艰。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基于“新的工业”发展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成了在现代世界赓续

发展中华文明的一个生命攸关问题。

现代民族国家有两个显著特征:基于工业化的现代经济发展和基于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体系。而这在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既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又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尤其是现代政党的成立会直接威胁到清廷的统治而必遭反扑,所以同盟会只能选择在日本东京成立。然而,在“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情况下,革命一途就成为必然选择。这意味着如何将几千年的王朝统治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党治理成为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中叶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关键性环节。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一方面是现代意识的逐步高涨(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则是传统规范依然保持着强大惯性。现代和传统的交织博弈决定了选择革命转型路径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历史昭示,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现代中国的诞生用了百余年时间。期间,围绕在中国如何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了不同的路径探索。

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入侵的深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激活:“各民族同胞越来越自觉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共御外侮,改造国内政治与社会结构,才能使中国走出困境,实现国富民强。”^[31]与此同时,中国人的现代国家意识也开始萌发。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成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意味着觉醒了的中华民族基于共同体意识已开始尝试构建自己的现代民族国家。但由于其诸弊端及后来北洋政府的资本买办性和国民党政府“生搬硬套西方的政治制度,结果导致军阀、政客竞相倾轧,社会动荡不堪”,^[32]所以尽管“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33]这意味着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路不适合中国。从根源上讲,这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以资本为主导和驱动力的社会不可能解决大规模人口的生存问题,结果导致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不聊生。从文化意义上讲,中华文化与资本主义的结合解决不了中国的核心问题。因此,在民族救亡过程中,“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主心骨凝聚各族各阶层力量,迫切需要真理的光芒照亮前进的方向。”^[34]中国共产党应时应势应事而生。“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便有了最先进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革命便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便踏上了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光明道路。”^[3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赓续发展中华文明探索之路是正确的,顺应了中华文明现代赓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如何通过革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36])——走向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如何通过发展生产力——基于工业化的现代经济发展——建设和发展现代民族国家。亦即,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37]并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魂”。其根源在于:一是几千年来中国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凝结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并引导着中国人的日常生产生活现代转型;二是因为,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实践成就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行”,即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现代转型。同时还表明了作为一种外来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具有的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之规律相契合。也只有契合了这一规律,外来思想文化才能成为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既是解决中国核心问题

的内在要求,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获得长足发展的具体化要求;对于中华文明现代赓续发展而言,就是要经由“结合”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38]因而,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既包含了中华文明本体中的优秀内容,又包含了汲取的外来积极因子,更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创造的革命文化和先进性文化,从而形成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内涵。

但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基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社会形态具有非连续性)、旧邦新命(“旧邦”是指故土家园的政治空间载体,“新命”指的是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使命)的历史纵深及现代文明的展开方式,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努力可拓展为中国近代以来开始走向现代的奋斗历程,并在历史的纵向比较中凸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取得辉煌成就。若从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不断丰富历史看,正是在中国走向现代进程中,作为复合型概念(政治和文化)的中华民族才具有了现代内涵并被确立下来,成为表征中国人(乃至华人)的一个文化心理符号。

四、世界意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基本特征。但自人类文明发展基于“新的工业”的现代化方式展开以来,这种多样性开始由分散走向整体,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39]亦即,西方发达国家基于早期工业化,在走上了现代工业文明之路后,凭借其“先发达”的决定性优势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对发展中国家或者后发达国家进行了广而深的殖民,试图构建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一统”。尽管“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0]但也正是这个时间差使得工业较发达的国家有足够的空间来炮制“西方=先进”“非西方=落后”的各种理论以贬低他国努力和美化自己,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观念和模式,并以此图谋取代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历史终结论),抹杀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特征(内含西方强调的所谓标准秩序与事实上的多样性之冲突)。虽然西方现代化因其深刻的内在矛盾使这一试图注定不会成功,但其无疑会增加人类文明发展的曲折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为这一曲折进程点亮了一盏明灯,并以新的姿态宣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样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41]

文明从不是一个抽象概念,任何一种文明首先是在一定的区域、民族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即首先是以区域性文明呈现出来的,同时又属于整个人类文明范畴。经由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亦如此。这就是说,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是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现代形态,同时又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中国形态。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我们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新视角。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是在解决一定区域内人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中形成的。自中华文明在近代蒙尘以来,中华民族随着列强入侵的加深而陷入存亡之秋,故救亡图存是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的主要历史任务。只有完成了救亡图存历史任务才能确保和赓续这一方文明。在此历史诉求下,基于其时世界发展大势,通过现代政党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对内聚力和对外御敌成为共识。“中华民国”的成立及其后续发展,尽管在中华文明赓续发展史上具有了第一次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尝试的开创性意义,但由于其最终对内不能有效

聚力发展现代经济、对外不能有力御敌完成民族独立任务而失败。基于中华文明现代赓续发展的强烈诉求,历史为近代中国现代性转型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中国共产党应时应势应事而生并领导中国人民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走向了社会主义,既完成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性任务,还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基于现代经济发展解决了14亿人的绝对贫困,现正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有信心、气度和能力,确证了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中国正确性。

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角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完成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重任,关键就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的“坚持”和“两个结合”不仅具有创造新历史、重塑新文明的方法论意义,更内涵了中华文化之坚韧品格,并在实践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中国特色之路,解决了栖住在中华大地上居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为中华文明现代赓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物质条件。

从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视角讲,“两个结合”不仅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而且还使其溢出中国,为摆脱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中国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尽管当今人类文明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42]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主要体现在“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和“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两个方面。

在“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方面。从本质上讲,这种“不同”和“新图景”主要体现在是否遵循了现代化的人本属性,即“以资为本”和“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理念及实际运行比较。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上的成功而构筑起海外霸权(包括基于“西方中心论”建构起来的“现代化=西方化”话语霸权),将西方地域性现代化经验提升为全球现代化叙事并强力对外推广,企图按照西方殖民者的样子塑造世界现代化镜像以确保自身的优势地位不被撼动。历史表明,这种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的现代化因背离了现代化的人本性而内在悖论凸显,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又把人类文明导入了违反人类本性(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后的局部战争)、违反自然规律(生态危机)的历史歧途中。这体现了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局限性和非天然合理性,从而为开辟别样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反思空间。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辟了另一条在发展中国家以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即不是通过战争、殖民、掠夺,而是基于自主性、内生性的自我积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并以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五大中国特色”呈现于世,充分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本性,将现代化拉回到正途,并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多样现代化路径探索提供了典型范例。

在“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方面。这里的“发展方向”不仅具有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意蕴,而且还蕴含了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致的人与自然对立的工业文明向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生态文明转型,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为化解当前人类面临的多种危机提供了中国方案,从而为世界现代化探索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由于资本的肆意扩张,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导致了当前人类不得不面对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四大挑战,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威胁。“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拷问着世人的心灵。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根植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中国式现代化,将中国国情与借鉴国际经验,传承弘扬历史文化与协调融通现代文明,造福中国人民与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擘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与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有机结合起来,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践行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推崇包容互鉴的文明观、主张合作共赢的发展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破解当前人类挑战、开启美好未来提供了方向指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致的人与自然对立状态扳回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极力推进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有机统一,有力保护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回应了时代关切,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美好夙愿,并在理论上丰富了人类对现代化的认识,实践上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成为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国际新秩序的价值指引,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新变化,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后来者居上的发展前途和优势。

注释:

- [1][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7-18、17页。
- [2][7][8][9][10][12][13][14][29][37][38]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 [3]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
- [5]马社香、王卓越:《“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王卓越回忆1965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期间的一次谈话》,《党的文献》2006年第3期。
- [6][20][24][26][3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64、3、3、2、62页。
- [11]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35页。
- [1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97页。
- [16][17]《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 [1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 [19][3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5、1357页。
- [2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 [2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111-112页。
- [23]《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9页。
- [2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 [27]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18期。
- [28]《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 [30][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35页。
- [31][32][34][35]本书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年,第288-289、293、293、296页。
-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 [41]习近平:《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 [42]《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